

忽說此人是我 ——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

張運宗**

摘要

譚嗣同的「烈士」與「思想家」形象，在中國近代轉型時代具備普遍性和特殊性，此為歷來學者研究的重心。本文擬跳脫理論模式、擺脫「烈士」的必然論證，以及《仁學》的思想內涵，而是透過譚嗣同留下的文本，追索其人在思想成熟時期之前的性格養成；從「先祖」、「親情」、「生死」和「遊歷」四個面向，深入探討譚嗣同的性格是在「傳統」的基調上，拉出「生」和「死」的兩極，讓多元矛盾的因子相互衝撞、震盪後，凝聚成為不容於世的絕對孤獨。其人朝向激進改革之道，乃是意欲衝決自我矛盾性格所撕裂、交織而成的「網羅」。

關鍵詞：譚嗣同、譜牒、傳統、孤獨、經世

* 本文承蒙李國祁老師指導，誠摯申謝。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

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

春夢醒來麼？

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

唯有瓶花數支，相伴不須多。

寒江才脫漁蓑。

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

鑒不因人，形還問影，豈緣醉後顏酡？

拔劍欲高歌。

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

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¹。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1865-1898）不喜歡作詞，十八歲寫下的這首〈望海潮—自題小照〉是他罕見的詞作。不喜歡詞之「靡」，卻以詞的形式書寫「自題小照」，且認為「微有氣骨」；回顧十八年來柔情與壯志後，乍然一句「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譚嗣同究竟是何許人？

譚嗣同誓當變法流血第一人，乃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²「戊戌政變」時他名列「六君子」之一，斬

¹ 〈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五十〉，《譚嗣同全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2），頁277。

² 梁啟超，〈譚嗣同傳〉，《譚嗣同全集》，頁524。

首菜市口，實踐了他的決心。《仁學》經梁啟超出版³，令譚嗣同名列近代思想家之林。梁啟超作序，劈頭即嘆：「嗚呼！此中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⁴日後，他為變法尋求理論依據而著《清代學術概論》，確立了譚嗣同的歷史定位：「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歲；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仁學》），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慧星』。」⁵「慧星」一詞，符合譚嗣同願作變法流血第一人的心願，也適切地建立了譚嗣同的形象：「烈士」與「思想家」。事實上，在「慧星」的基調上，歷年來關於譚嗣同的研究已經超過百篇論文、十數本碩博論文與專書，以及多場研討會⁶；學者的論述即環繞在譚嗣同的政治思想、佛學思想、哲學體系和歷史地位等方面⁷。

但是翻看譚嗣同的年譜。光緒二十年（1894）他在〈三十自紀〉說：「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並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壯飛』。」⁸就在盡棄舊學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戰爭激使他「壯飛」：結識康、梁，致力新學，拜訪傅蘭雅（John Fryer）乃知西學，結識楊文會而參透佛學。光緒二十

³ 《仁學》出版的考訂，參見湯志鈞校注，《仁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附錄：仁學版本探源〉，頁104-141。印永清評注，《仁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仁學的版本」，頁39-52。

⁴ 梁啟超，〈仁學序〉，《譚嗣同全集》，頁515。

⁵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71），頁156-157。

⁶ 1998年「戊戌政變」百週年前後數年間，召開研討會而有論文集出版者，至少有：《瀏陽算學社創建100周年暨譚嗣同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科協、湖南科協，1995）、《海峽兩岸譚嗣同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南省文史委員會、台灣中華仁學會，1996）、《仁學百年：譚嗣同仁學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1998）、《譚嗣同仁學思想與新世紀之人文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人文展望學會，2000）。

⁷ 有關譚嗣同的研究回顧，參見陳善偉，〈八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1984，頁139-152。李喜所，〈百年譚嗣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廣東社會科學》，第1期（2000），頁77-82。田愿靜激，〈1949-1999五十年間譚嗣同研究綜述〉，《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頁83-87。程克雅，〈台、港及海外地區近五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4卷1期（2004.3），頁121-132。

⁸ 〈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204。

二年（1896）他開始著作《仁學》，次年成書。透過以上簡略的陳述，不難看出，歷來的研究焦點其實是光緒二十至二十四年（1894-1898）的譚嗣同，是把他視作中國近代轉型時代（1895-1911）的代表性人物之一⁹，進而探究其思想內涵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前的譚嗣同，或說學者對於其人生平性格養成的討論，大多是放在某個理論架構之下，或是某個「大環境」之中，作為「烈士」和「思想家」的「溯往」或是「佐證」。

1980 年代末期，張灝以《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開啟了「心路歷程」的研究視角¹⁰，迄今此書仍是深入譚嗣同內在觀念極具代表性的力作。張氏強調譚嗣同的思想成熟時期是 1890 年代，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代表性，從其人「心路歷程」反映成《仁學》的三個重要觀念：世界意識、唯心傾向和超越心態。張灝指出：「這三種傳統觀念在譚嗣同的生命中熔鑄成一種特有的理想主義精神。他的烈士精神可以說是這種理想主義精神在他生命中的體現，震撼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為早期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樹立了一個典型。」¹¹譚嗣同的「烈士精神」，正能印證張灝研究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所建立的「幽暗／批判／超越」的理論架構，也確定譚嗣同在現代知識份子中的代表性¹²。

光緒八年（1882），十八歲的譚嗣同在「自題小照」結尾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光緒十七年（1891），二十七歲的譚嗣同在〈畫像贊〉破題：「噫！此為誰？」¹³相隔十年，相同

⁹ 中國近代「轉型時代」（1895-1911），最早提出者當是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另參見張灝，〈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學出版社，1985），第五章，頁322-392。

¹⁰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¹¹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135-136。

¹² 相關理論可參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¹³ 〈畫像贊〉，《譚嗣同全集》，頁507。

的提問，或許是抒情的反問，或許是真實的體認，對於我們而言，卻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譚嗣同是何人？當前豐碩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我們嘗試多視角研究的基礎與深入反思的命題。因此，本文擬先跳脫理論模式、擺脫「烈士」的必然論證，以及《仁學》的思想內涵，而是透過譚嗣同在三十歲時行人生總整理，寫作的《瀏陽譚氏譜》四卷、〈莽蒼蒼齋詩自敘〉和〈三十自紀〉，追索其人思想成熟時期之前的性格養成。

本文論述緊扣於譚嗣同三十歲時寫下的三份文本，乃拉出「先祖」、「親情」、「生死」和「遊歷」四個面向，作為討論其人性性格養成的切面。值得一提的是，譚嗣同性格養成的歷程中，師友交往有相當重要的影響¹⁴，特別是從時文制藝、詩詞文章、史地典謨，一直到宋明理學、船山學說、西學新政，乃至於莊子、佛學、基督教，整個學習過程的兼容並蓄，適切地反映他性格的轉化。然而這些面向似非譚嗣同在三十歲時進行人生總整理的重心，而且這必須面臨涵蓋思想、心態在內，更為複雜交錯的諸多面向，限於時間，本文暫時無能處理這部份。幸而此一研究範疇向為學者討論研究重心¹⁵，而本文探討譚嗣同充滿矛盾的複雜性格的養成與轉化，或可與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相互參照、佐證與討論。

本文所依賴的「文本」有三種：陳乃乾編的《譚瀏陽全集》是影印「鹽城印鸞章立齋校刊本」，附錄的（年譜）主要據此。台灣 1977 年出版的《譚嗣同全集》，由於長期閱讀習慣，正文論

¹⁴ 例如，譚嗣同自道：「又得賢師友如辦蓋師之剛健文明，王信余之篤實輝光，涂直初之質直，貝元徵之溫純，而又推元徵足醫嗣同之偏弊。」另，他也曾歷數瀏陽學術、文風之發展，所述之人皆其師友。而〈論藝絕句〉堪為清代瀏陽學術之總章。但是，一如他矛盾性格的養成，他與師友之間也是分分合合。〈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三十、四十〉，〈論藝絕句六篇〉、〈致劉淞笑信一〉，《譚嗣同全集》，頁 261、270-271、490-491、376。

¹⁵ 參見賈維，《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湖南：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賈維結合前人的研究，強調關於譚嗣同的研究多集中於「縱向」，缺乏「橫向」的討論，所以他將重心放在社會上師友關係的考察，以作為「晚清知識份子演變的一個歷史縮影」（頁14）。

述大致據此。蔡尚思、方行編的《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基本上是依譚嗣同自編出版的文集，並增補未收者，似較為完整地呈現譚嗣同本意，頗具參考價值¹⁶。

所謂的「文本」，還賦有另外一層意義。在上述三種《全集》的閱讀中，我們可以三十歲作為一個界線。光緒二十年（1894），譚嗣同三十歲，他進行了一次人生的總整理，雖說「行並其所悔者悔矣」，乃自名「壯飛」，但我們可以透過他的「悔」，窺探他自我檢視的三十歲以前的生命歷程；然後，透過文集的書信詩文，追訪從出生到三十歲的譚嗣同。兩種「文本」的撞擊將會產生一種「談辯境域」¹⁷，或許能讓我們更貼近譚嗣同的性格養成。

二、先祖

光緒二十年（1894），譚嗣同三十歲時進行的人生總整理，包括：《瀏陽譚氏譜》四卷、〈莽蒼蒼齋詩自敘〉、〈三十自紀〉，涵蓋三個層次：族譜、少作、自省。在時間軸上，這三個層次由遠至近；在個人性格上，則是自外而內，此正符應我們探索他性格養成的進程。因此，可以先來看《瀏陽譚氏譜》。

譚嗣同在〈瀏陽譚氏譜敘例〉劈頭即道：「譜牒古為專門之學，今斯滅久矣，盡矣。」¹⁸接著考據「譜牒」的史學史，強調「譜牒，又宗法所賴以不終墜也。」然後，極盡考據之能事，闡發「宗法」之義，而「宗法」即是他「弟詳本支」論述的重點，因為：

¹⁶ 陳乃乾編，《譚瀏陽全集（附年譜）》「鹽城印鸞章立齋校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

¹⁷ 「談辯境域」借用了余英時為 discourse 作的中文翻譯。其實，text 和 discourse 都能譯作「文本」，這很能凸顯「文本」的理論特質，亦即「文本」具涵了 text / discourse 的雙重性。此處引用「談辯境域」只是簡單區分 text 和 discourse 的不同，而且「談辯境域」一詞很能契合我們以三十歲作為譚嗣同的研究切面，所形成的討論。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頁77。

¹⁸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57。

宗法者，王政之精微而博大，又易易者也，非繁重迂緩之類也。舉之則立行，行之則立效¹⁹。

他把一姓之「譜牒」結合一國之「宗法」，建立「齊家」到「平天下」的傳統秩序；更把「譜牒」視作「史之根源」²⁰，一舉確立了他修族譜的歷史定位與經世意義。

然而透過「譜牒」，他希望描繪的家族理想圖像是什麼？

夫諸父諸兄之相為聚處，敬宗收族之相與周旋，任卹睦婣，歡以相即，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自戒溢持滿之事。我生不辰，焉可源源如此哉？分崩離析之誰止，還安定集之無時²¹。

「任卹睦婣，歡以相即，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這幅傳統中國家族和睦的景象，是譚嗣同所企望的，卻也是他無法擁有，也不知何時能夠實現的境地。光緒二十年（1894）仲冬開始修譜，訖歲除，短短的時間內，完成《瀏陽譚氏譜》，可以感受到他亟欲「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²²的決心，亦可見其考據功力之紮實，更能窺探到家族和樂的傳統理想。譚嗣同在三十歲以前歷經母喪、兄亡、子夭，所謂的家族和樂應該是種渴望而不可得的「矛盾」。

「矛盾」，成為我們探究譚嗣同性格養成的起點。我們也從《瀏陽譚氏譜》進入他的「家族」。

譚嗣同追溯祖源時，認為「舊譜頗崇嚴謹，不驚繁縟，上溯僅及宋靖康而止。」²³在「信」的原則上，他認為舊譜遠溯洪荒，稱譚氏系出黃帝之孫顓頊後裔，是「不詳所本，又不詳何姓。」並且批評歷代學者「無所本」的謬誤，所以他直接進入《說文》的「偃，國也。齊桓公之所滅，從邑覃聲。」考據「偃」、

¹⁹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59。

²⁰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58。

²¹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6。

²² 同前註。

²³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5。

「郟」、「譚」的關係，證明「譚氏」姓羸，「譚城」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²⁴。有趣的是，他引徐鍇《繫傳》：「杜預曰：『東海褰冥是也（不知何據），子爵。』」²⁵日後「不知何據」的「東海褰冥」成為他所認定的譚氏源頭，在〈三十自紀〉末尾即言：「東海褰冥，厥系孔多；姓羸氏譚，作瀏於家。」²⁶而且，「東海褰冥」也成為他的眾多別名之一。

「譜牒」關係著「宗法」，是維護傳統秩序的根本，也是作史的根源。所以譚嗣同以「不詳」否定、批判傳說或學者的看法，透過繁複詳贍的考據，確立譚氏的淵源脈絡。然而，為什麼他最後卻是以一個「不知何據」的「東海褰冥」作為譚氏源頭？這個略帶神秘傳說色彩的名字甚至成為他的別名？檢閱譚嗣同的文本，我們暫時無法找到直接的詮釋。但是透過這個「矛盾」，我們可以進一步地思考，別名原本就是藉由或具象、或抽象的簡短字彙，展現一個人的心志，在精湛考據的強烈對比下，更凸顯了「東海褰冥」展現譚嗣同生命中「傳統」與「浪漫」的雙重性格。

譚嗣同考據譚氏始祖在北宋時避金亂，自江南西路洪州新建縣樵舍，遷到福建路汀州長汀縣；明代，十四世祖譚功安（以綏）遷到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三傳譚逢琪避明末大亂，才遷至瀏陽縣東鄉寶蓋洞²⁷。譚氏「以武功著望於有明。二百餘年間，為侯伯者九世十人。」²⁸譚嗣同透過〈家傳〉，詳述了譚氏的「武烈」²⁹，甚至，「先世將門，閱於武烈，文學無聞焉」³⁰。然而到了譚逢琪之子譚世昌（濬

²⁴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1-164。

²⁵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2。

²⁶ 〈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207。

²⁷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5-166。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1。

²⁸ 〈啟襄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72。

²⁹ 〈啟襄府君家傳〉、〈崇安侯壯節公家傳〉、〈新甯伯蓋臣公家傳〉、〈太傅新甯伯莊僖公家傳〉、〈新甯伯平蠻公家傳〉、〈逸才府君家傳〉、〈濬軒府君家傳〉、〈熙亭府君家傳〉、〈步襄府君家傳〉、〈紹泗府君家傳〉、〈海嶠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72-193。

³⁰ 〈濬軒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83。

軒，1618-1707），譚氏一族出現「由武轉文」的關鍵性轉折。譚逢琪雖是明末諸生，但要等到譚世昌也成為諸生時，「始以詩禮厥家」，並且開始修譜牒、著家訓³¹。到了譚嗣同的高祖譚文明（熙亭，1729-1788）時，遷居瀏陽縣南鄉吾田市，隱居深山，「篤學固窮」³²，卻是「貧不能終讀」，死後，其子譚學琴（步襄，1766-1828）徙居縣城梅花巷丹桂坊³³，出任縣吏，家境才逐漸豐裕。譚學琴重建了失修的家廟，喜儒術，臨終前交託夫人：「勿令兒子廢學，十年後，汝當稍安，殆自信有以遺之矣。」後來，譚學琴因其子繼洵官運顯貴，而累贈光祿大夫，並奉旨旌表「樂善好施」³⁴。

譚嗣同藉由〈家傳〉敘述了明代先祖從靖難到抵禦李自成的武烈故事，也重建了由武轉文的詩禮家風。我們暫時不能推論，他是否在三十歲的時候，透過先祖的武烈故事建立死節忠君的正當性；但是，文武兼備確實是他生命歷程的學習與實踐。

以「矛盾」作為研究起點，分析《瀏陽譚氏譜》中譚氏淵源到遷居瀏陽的過程，可以發現譚嗣同透過修族譜，展現的是他性格中「傳統」與「浪漫」、文武兼備的雙重特質，這種多面向的雙重特質，時而矛盾、時而融洽地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交互作用。究竟這種複雜的性格是如何養成的？就成為我們追索的焦點。

三、親情

譚學琴有三子，譚繼昇（海嶠，1816-1886）為長子，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1823-1901）為三子³⁵。道光八年（1828），譚學琴去世，家道暴落，幾乎瀕臨三餐不繼的窘境³⁶。長子繼昇憤而棄學，繼承父業，出任縣吏，一心養親，及嚴格督促兩個弟弟讀書

³¹ 〈濬軒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83。

³² 〈熙亭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87。

³³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頁1。

³⁴ 〈步襄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88-189。

³⁵ 譚訓聰，〈瀏陽梅花巷譚氏世系簡表〉，《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

³⁶ 〈步襄府君家傳〉、〈海嶠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90、193。

³⁷。當他事業有成時，開始文武兼修。主持瀏陽團練，力抗太平軍；主掌「禮樂局」，購藏書，課經學；創會館於北京；修縣志；實義倉，「數十年用無弗給」³⁸。凡此作為，讓譚繼昇成為瀏陽譚氏的關鍵性人物。第一、他棄學承先業，令家道豐裕；第二、他重振譚家武風，且不廢文學，更具經世作為；第三、譚繼洵成為譚家在科舉仕途上最顯赫的人物，受其影響最深。譚嗣同在〈海嶠府君家傳〉末尾就說，譚繼洵任官甘肅時，譚繼昇苦苦思念，臨終前，「猶誦《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爾。』」聲嘶而氣絕。烏虜！吾世父海嶠府君，可以傳矣。」³⁹若對照譚嗣同日後的行徑，譚繼昇文武兼修、一肩擔當的俠義氣質，應該也深深地影響譚嗣同的性格養成。

譚繼洵，字子實，號敬甫，又號劍芙。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舉。或許是個性使然，更有可能是其兄譚繼昇的嚴格督促，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軍興，譚繼洵毫無作為，只是努力準備科舉。十年後，咸豐九年（1859）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次年應殿試，補授戶部主事欽加道銜。同治十三年（1874）官戶部員外郎，次年轉戶部郎中，旋赴北通州監督坐糧廳，驗收漕糧、催督轉運。光緒三年（1877）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加二品銜。後擢甘肅按察使、布政使，頗有政績⁴⁰。十五年（1889）升湖北巡撫，張之洞（1837-1909）北召時，曾短暫地兼署湖廣總督。他雖參與湖北的自強新政，但似乎並不積極，當張之洞和陳寶箴（1831-1900）聯銜陳奏新政時，他皆敬謝不敏⁴¹。據說，楊深秀（1849-1898）曾批評他「守舊迂拘」⁴²。跳脫自強派或維新派的觀點，我們應該可以粗淺地論斷，譚繼洵是個一心透過科舉

³⁷ 〈海嶠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93。

³⁸ 〈海嶠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92-193。

³⁹ 〈海嶠府君家傳〉《譚嗣同全集》，頁193。

⁴⁰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8。

⁴¹ 《清史稿》，卷464，〈列傳·陳寶箴〉。

⁴² 不僅如楊深秀的維新派如此批評，翁同龢對譚繼洵的印象也是位「拘謹」的「禮法之士」，甚至怪道：「從前不知，而有此子（譚嗣同）何也？」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頁20、46。

仕途成為「循吏」的傳統士大夫。

如果回到譚嗣同留下的書信詩文，非常奇怪的是，從請老師到遊歷西北，至少前半生與父親緊密相隨，但他對父親著墨甚少。在有限的記述中，約略只能看出譚繼洵對譚嗣同有三方面的影響：第一、從譚嗣同小時候以為「父慈母嚴」⁴³，以及他在〈先仲兄行述〉中提及「父師約束嚴」⁴⁴，似乎可以窺探到，譚繼洵並非不是「嚴父」，而是對這位正室所生的么子較為放縱。第二、在〈三十自紀〉中，譚嗣同以大半篇幅描述「堪繞地球一周」的遊歷路程⁴⁵，這段遊歷對譚嗣同的性格養成至為關鍵，是父親讓他能有這段遊歷。第三、譚繼洵當然希望譚嗣同像自己一樣走向科舉正途，譚嗣同「受書以來，未嘗不培其有用之精力，鉅心鏤肝，昕夕從事」⁴⁶，「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試」⁴⁷，六次不中，決意放棄⁴⁸。光緒十九年（1893）譚繼洵為他請了個頂戴花翎，譚嗣同親自致信恩師歐陽中鵠商議加級事宜⁴⁹。「放縱」是桀傲不馴的性格養成因子之一⁵⁰；「遊歷」是浪漫情懷的抒發，更拓展了引為自傲的廣闊視野；「科舉」則是雖然鄙棄，卻又不得不遵循的傳統正途。三者又在「保守」與「激進」、「傳統」與「浪漫」之間，養成譚嗣同充滿矛盾的複雜性格。

不同於對父親的缺乏著墨，譚嗣同對母親有著深深的眷戀。道光二十七年（1847）譚繼洵娶同鄉十九歲的徐五緣（1829-

⁴³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9。

⁴⁴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1。

⁴⁵ 〈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205-206。

⁴⁶ 〈仲叔四書義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6。

⁴⁷ 〈仲叔四書義自敘〉、〈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156、206。光緒十一年（1885）譚嗣同首次應鄉試，光緒二十年（1894）第六度應鄉試，正好十年。（見附錄）

⁴⁸ 據說，譚嗣同還曾經在時文課本上奮筆題曰「豈有此理」。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頁6。

⁴⁹ 〈上歐陽辦薑書七〉，《譚嗣同全集》，頁305。

⁵⁰ 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見到譚嗣同，即在日記中論道：「譚嗣同（號復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蘇府，三十二歲）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四月條」，《戊戌變法文獻彙編》（台北：鼎文書局，1973），第一冊，頁517。

1876) 為妻。兩年後譚繼洵中舉，接著為取得進士奮鬥了十年。這段時間，先後生下長女嗣懷（懷貞）、長子嗣貽（癸生，1853-1876）、次女嗣淑（淑貞）、次子嗣襄（泗生，1857-1889）⁵¹。譚嗣同說道：

光祿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雞鳴興爨，汜掃澣滌，紉績至夜，分不得息。恆面擁一兒，背負一襁，提嬰自行汲，筋力強固，十餘年不以厭倦⁵²。

即使譚繼洵謀得賜進士出身，家道日豐，徐氏仍然堅持勤儉持家：

食僅具蔬筍，亦不得逾三四肴，每食以布自衛，云恐浣衽。衣幫儉陋，補綻重複，有一絲蘊衣，縷縷直裂，依稀出蘊，自嗣同知事即見之，卒未一易⁵³。

在譚嗣同情辭並茂的生動描述下，我們看見了一位刻苦耐勞、相夫教子，一心做成功男人背後推手的傳統女性。

徐夫人對於子女的管教相當嚴格，只要見到子女坐姿不正，就「終日不一言笑」，如果犯了過失，更是施加嚴格體罰。塾師也常以母親克勤克儉的美德，激勵譚氏兄弟：「汝曹嬉遊惰學，讀無不安於心乎？」在這種教育薰陶下，譚嗣同幼時還懷疑傳統師訓是錯誤的，應該是「父慈而母嚴」⁵⁴。

母親堅持的傳統美德，是否影響了譚嗣同在《仁學》中對「傳統」的強烈批判？在追索譚嗣同性格養成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他完全符合「傳統」的要求⁵⁵。同治十年（1871）徐氏帶長子

⁵¹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頁2。

⁵²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9。

⁵³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9-200。

⁵⁴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9-200。

⁵⁵ 光緒二十四年（1898）譚嗣同赴北京前，留詩予妻子李潤，末道：「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閒話耳。」或許「說閒話」別有深意，但我們應該可以說，母親的「傳統」影響了他對妻子的要求。〈戊戌北上留別內子〉，《譚嗣同全集》，頁495。

嗣貽返回瀏陽就婚，臨行前，戒令譚嗣同切勿思念。他「堅守是言。拜送車前，目淚盈眶，強抑不令出。」外表的堅強，抵不過內心的脆弱，終因思念成疾，日益羸弱。次年，徐氏歸來，他始終不承認思念之情，徐氏笑道：「此子倔彊能自立，吾死無慮矣。」⁵⁶這一句話透露出，徐氏雖然嚴厲，卻相當瞭解譚嗣同的性格；譚嗣同能理解母親「愛至責亦繁」⁵⁷的心態，或許正是他對母親深深眷戀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徐氏兼具身教言教的「傳統」美德，讓譚嗣同在幼年時期就已養成「倔彊」的性格，儘管內心情感豐沛，外在表現卻能堅如磐石。簡單的說，「倔彊」適切地展現譚嗣同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之間的矛盾。

光緒二年（1876）徐氏感染喉風⁵⁸病逝，這對譚嗣同是「殘割腐心」的打擊⁵⁹。光緒十六年（1890）他創作〈湘痕詞八篇〉追憶失去親人的傷慟，第五篇述及：

……少小相煦煦，愛至責亦繁。謂是陳腐言，掩耳斃其喧。
良親會有窮，德音不再宣。嗟終日因依，胡為若棄捐。……⁶⁰

隨後，他也感染喉風，昏迷不醒，自謂「短死三日」⁶¹；死而復生，面對的卻是父親搬出坐糧廳，另外租屋避疫，只剩小妾盧氏照顧。盧氏生有三子二女，相當不善待譚嗣同，甚至常在譚繼洵面前極盡挑撥，連她的親生子女都看不過去，反而和譚嗣同非常親近。這段悲傷的成長過程，是譚嗣同師友眾所皆知的故事⁶²；但在他的書信詩文中不見記錄，只能說「棄捐」適切地表達他的心

⁵⁶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200。

⁵⁷ 〈湘痕詞八篇並敘〉，《譚嗣同全集》，頁453。

⁵⁸ 乾隆年間鄭梅澗所著的喉科專書《重樓玉鑰》，將喉風分成36種，包括「喉間發白」，即今日的「白喉」。鄭梅澗，《重樓玉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⁵⁹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8。

⁶⁰ 〈湘痕詞八篇並敘〉，《譚嗣同全集》，頁453。

⁶¹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8。

⁶² 梁啟超為譚嗣同立傳，即道：「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梁啟超，〈譚嗣同傳〉，《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四冊，頁50。關於譚嗣同與其庶母的關係，參見賈維，《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頁66-71。

情，此外，〈仁學自敘〉中所謂：「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非生人所能任受。」⁶³或許，庶母的虐待正是他所面對眾多的「綱倫之厄」之一⁶⁴。

值得仔細探究的是，師友的敘述與後人的研究，多是立基於譚嗣同的批判性格，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他在母親嚴格管教之下，聽從母訓所養成的「孝道」傳統⁶⁵。「孝道」結合「倔彊」，或許譚嗣同縱有不滿也不會表現在外，所以在譚嗣同的書信詩文中，也不見對庶母的著墨。更進一步地探究，同樣是「傳統」，母親代表的是婦女的美德，庶母代表的是小妾的惡劣；母親是「愛至責亦繁」，庶母是令他真實感到「棄捐」。「傳統」引發的兩極化的矛盾，在譚嗣同需要母愛的童年時光和叛逆的青少年時期，對其性格養成必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這種矛盾有助我們理解，他在三十歲時透過《瀏陽譚氏譜》建立了「諸父諸兄之相為聚處，敬宗收族之相與周旋，任卹睦婣，歡以相即，樂酒今夕」的傳統人倫美景，卻又同時哀嘆：「我生不辰，焉可源源如此哉？分崩離析之誰止，還安定集之無時。」

瀏陽譚氏家風有兩個面向：文、武，大伯譚繼昇文武兼修、經世濟民的俠義氣質，正是譚嗣同亟欲達成的人格典範。父親譚繼洵的傳統循吏特質，在科舉仕途的基調上，給予了譚嗣同桀驁與浪漫的養成環境。母親徐氏堅守傳統婦德，令譚嗣同具涵濃厚的傳統道德觀。而庶母盧氏的虐待，則讓譚嗣同自幼即面對傳統所引發的兩極化矛盾。因此，親情對於譚嗣同的性格養成，是在「傳統」的主軸上，激發出其人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的矛盾。

⁶³ 〈仁學·自敘〉，《譚嗣同全集》，頁3。

⁶⁴ 張灝析論譚嗣同二十四歲所作的〈三鴛鴦篇〉，認為全詩描繪的正是父親寵妾，母親失寵的悲哀。亦可作為譚嗣同詩作中面對父親、母親、庶母的複雜情感關係的抒懷。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47-48。譚嗣同，〈三鴛鴦篇〉，《譚嗣同全集》，頁461-462。

⁶⁵ 關於譚嗣同謹守「孝道」的論證，可參見左舜生，〈譚嗣同評傳〉，《中國近代史話集》（台北：傳記文學，1986）。

四、生死

光緒二年（1876）春天，在譚嗣同性格養成的歷程上是個關鍵性的年代。這一年，北京癘疫橫行，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二姊嗣淑先受傳染，母親徐氏探視，也被傳染。二姊死後四天，母親去世，隔一天一日，長兄嗣貽死⁶⁶。「五日三喪」一詞，在譚嗣同的詩文書信中時常出現⁶⁷。單是這一年，他的親屬染疫病歿京師者就有六人⁶⁸。他自己也受到傳染，「短死三日」，因此譚繼洵為其取字「復生」⁶⁹。「死」，對一個十二歲的少年而言，是種突如其來的震撼，更是心靈至深的傷害。六年後，作〈望海潮〉的同一年，他返湖南應鄉試，回到故居感而詩云：「有人日暮倚人望，應念歸人歸未歸。」「誰知骨肉半為鬼，唯有亂山終古青。」⁷⁰充分流露他對親情的思念，以及「死亡」的陰影。

光緒三年（1877），譚繼洵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次年，譚嗣同跟隨父親前往任所，這是他第二次的西北遊歷。但此行並不順利。出發到襄陽以前，還有仲兄譚嗣襄陪伴，由於雇不到足夠的車，御夫嫌負荷過重，嗟怨不前，且不久同行者死去數人。過了襄陽，譚嗣襄離去，適逢西北大旱，一路上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餘人。剛懷著喪母鉅慟的譚嗣同，在西北的旅途中面對的是大自然無情造成的死亡景象⁷¹。

其實，譚嗣同幼時就處於「死亡」的陰影中。他五六歲啟蒙，八九歲時隨兩位兄長到宣武城南的私塾讀書，此地實際上是處亂葬岡。日後他有生動的追述：

⁶⁶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7-199。

⁶⁷ 〈湘痕詞八篇並敘〉，《譚嗣同全集》，頁452。

⁶⁸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1。

⁶⁹ 〈先妣夫人逸事狀〉，《譚嗣同全集》，頁198。

⁷⁰ 〈到家二篇〉，《譚嗣同全集》，頁492。

⁷¹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1。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頁5。

城中鮮隙地，民間蕘葬，舉歸於此。蓬顆累累，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疊骸其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莽；狸獫助虐，穿冢以嬉；臚骸如瓜，轉徙道路。加北俗多忌曆，棺中野雨日蝕漏，豁訝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⁷²。

年少的譚嗣同在這種環境讀書，一到晚上就大為恐懼，總會跑去找兩位兄長尋求慰藉。白天的時候，這裡成為兄弟三人遊玩探險的好地方。只是長兄譚嗣貽比較穩重，一出門就「健步獨往」，仲兄譚嗣襄則性格爽朗，因此譚嗣同和他的感情特別好。有回夏天，天雨初晴，兄弟倆在階下玩耍，譚嗣襄忽然離開，譚嗣同「四顧孑然，情不可已，遂嗷嗷以哭。」⁷³足見他對仲兄的依賴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譚嗣貽大譚嗣同十三歲，譚嗣襄大八歲，年齡差距頗為懸殊，但是長姊約大他十六歲，次姊約十二歲，相較之下，譚嗣襄和他的年齡差距最短了。而且，譚嗣貽個性穩重又早逝，所以譚嗣同和他親近的機會並不多。譚嗣襄允文允武，「志高才挺，闊達不矜細節」，「究心經世」⁷⁴，正是譚嗣同欽服的人格典範。母親死後，庶母虐待，父親疏落，長他八歲的仲兄填補了親情的缺口，疼愛他、瞭解他，不僅是精神支柱，也是共患難的知交。

譚嗣同和譚嗣襄一起讀書，一起參加多次鄉試⁷⁵。光緒十四年（1888），兄弟同赴長沙應試，不中，譚嗣襄決定出遊。原想上京師謁選，卻缺乏盤纏，由於次姊嗣淑嫁唐景崧異母弟，所以他就到了台灣⁷⁶。兄弟握別漢口，在船上譚嗣同賦詩「他年擊楫渾閒事，曾向中流鍊膽來。」展現一派瀟灑豪情。然而到了真正分手

⁷² 〈城南思舊銘并敘〉，《譚嗣同全集》，頁499。

⁷³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1。

⁷⁴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1、202。

⁷⁵ 光緒八年（1882），嗣襄鄉試不中，光緒十一（1885）、十四（1888）年，兄弟同赴長沙應鄉試，俱不中。

⁷⁶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2。

的那一刻，他卸下「倔彊」的外表，傾洩心中濃濃的不捨：

燕燕歸飛影不雙，秋心零落倚船窗。波聲和夢初離枕，山色迎人欲渡江。淚到思親難辯點，詩因久客漸無腔。填胸孤憤難堪語，嗚咽寒流石自淙⁷⁷。

光緒十五年（1889）是譚嗣同面臨生死境地的另一個關鍵年代。譚嗣同自蘭州赴京師，原本約好仲兄一起應鄉試，他還帶著最疼愛的姪子譚傳簡（其祖即譚繼昇）相伴，一道重遊宣武城南，細數追摩當年的一點一滴，小姪子卻無法理解，令他非常失望，「以為非仲兄無足以語此」⁷⁸。五月，譚嗣同赴台僅一年就病逝台南蓬壺書院⁷⁹。兩年後，譚嗣同追憶收到噩耗的景象：「創鉅痛深，瞢不省事。哭踊略定，則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顧宛五六歲孺子也。」他急於尋求慰藉，甚至「禾黍布隴，廢塚斷碑，以及壞牖蛛絲，皆若與我有一日之好。」⁸⁰又兩年，他對仲兄的思念有增無減：

四五年來獨遊子處，仰而歎，俯而悲憫。方今思昔者，心懸之而益孤，遇參之而彌舛。目之而形枯，耳之而聲惻，其始也微動，而其究也無窮。所為斂口而嘯，哆口而歌，哭非哭，笑非笑，輪困膠葛，以寒噓於靈臺之中⁸¹。

徐氏所生的三子二女，只剩譚嗣同一人。仲兄死去的同年冬天，譚傳簡也死。這一年，譚嗣同的獨子出生，取名「傳鐸」，或許取「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之意，此子可以繼承仲兄和他自己所秉承的家風，但是，次年傳鐸夭折。譚嗣同真正陷入孑然孤獨的憂傷之中。

⁷⁷ 〈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五十一〉，《譚嗣同全集》，頁277。

⁷⁸ 〈城南思舊銘并敘〉，《譚嗣同全集》，頁499-500。

⁷⁹ 〈先仲兄行述〉，《譚嗣同全集》，頁203。

⁸⁰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1。

⁸¹ 〈遠遺堂集外文續編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2。

夫憂傷之中人，有飄忽衝盪纏沈盤蟄，挾山嶽之勢，挈烈風雷雨之暴，舉血氣心知所能勝以幹事者，猝不能當一擊。氣息蕩然，若存若亡，抗之則無上，按之則無下⁸²。

「倔彊」與「憂傷」撕裂了譚嗣同，「若存若亡」正是最適切的寫實。「無以自解於己，益無以受解於人。」因為，「意之所存，己且無以得之，又何以為乎人哉！」⁸³既不容於己，又不容於世，譚嗣同複雜的矛盾性格被撕裂了。仲兄死後一年，「同母五人，偶影坐弔」，譚嗣同寫下〈相痕詞八篇〉，顯露無止盡的憂傷。光緒十七年（1891），他寫下〈畫像贊〉，應是外在行為與內在心理陷入絕對「孤獨」，自覺不容於世的最佳自我寫照：

噫！此為誰？嶮嶮其骨，稜稜其威；李長吉通眉，汝亦通眉；於世生二十有七年矣，幸緋衣使者之不可汝追。天使將下，上帝曰：「咨！其文多恨與制違，然能獨往難可非；放之人世稱天稟，海枯石爛孤鸞飛。」⁸⁴

三十歲以前的譚嗣同，在見識無數次的生死中，讓他養成充滿矛盾的複雜性格，更在生死之間不斷地被撕裂，致使完全陷入不見容於世的孤絕境地。或許譚嗣同日後專研佛學，參透生死；也或許有了罕見的生死經歷，讓他在佛學中得到解脫⁸⁵。甚至可以看到光緒十九年（1893）他輯成懷念仲兄之作的《遠遺堂集外文續編》，次年他進行人生總整理，藉〈三十自紀〉「行並其所悔者悔矣」，而自名「壯飛」。但是，譚嗣同從未走出「孤獨」，甚至可以說他選擇、捍衛自身不容於世的「孤獨」，把這種「孤獨」轉化成為「輕氣球」般的強烈反叛性格，「壓之則彌漲，且陡漲矣！」⁸⁶戊戌政變前，他和汪康年聯合致信恩師歐陽中鵠，更自剖道：

⁸²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1。

⁸³ 〈遠遺堂集外文續編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2。

⁸⁴ 〈畫像贊〉，《譚嗣同全集》，頁507。

⁸⁵ 〈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二十〉，《譚嗣同全集》，頁255。

⁸⁶ 〈上歐陽辦薑師書二十七〉，《譚嗣同全集》，頁338。

嗣同縱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是此軀曾蟻虱千萬分之一之不若⁸⁷。

五、遊歷

「縱人」，展現譚嗣同選擇了不容於世的孤獨，並轉化成為歷生死而輕生死的烈士精神。「縱人」也適切地體現在整個轉化過程中，他性格養成的重要關鍵：「遊歷」。

在「行並其所悔者悔矣」的〈三十自紀〉裡，他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記述光緒元年（1875）至二十年（1894）的遊歷。光緒十五年（1889）五月譚繼襄病死，十一月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這個關鍵性的巧合，讓譚嗣同的遊歷大略可分兩期：光緒元年至十五（1875-1889）年，往返於甘肅和湖南之間；光緒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以湖南、湖北為中心，循水路遊歷江浙和北京之間。他總結道：

然行既萬有餘里矣，合數都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經大山，若朱圉、烏鼠、崆峒、六盤、太華、終南、霍山、匡廬無算；小水，若涇、渭、漆、沮、滄、灞、洮、潼、灃、藍、伊、洛、澗、灇、橫、衛、汾、沁、滹沱、無定、沅、澧⁸⁸、蒸、淶無算；形勢勝蹟無算。……續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遠覽以寫憂，浮深縱涉以騁志，哀鳴蕭於凌霞，翼壘鼓於華輶乎？不敢知也。聊復登錄，識一時欣遇，云補遊記焉爾⁸⁹。

不難看出，他對自己遊歷經驗的自豪與珍視。值得注意的是，對他而言，「遊歷」有兩個重點：「憂」與「志」。翻看《全集》中的詩文，「憂」與「志」正貫穿了他的遊歷詩作。〈三十自紀〉在記述遊歷前，他先檢視了三十年來的著作，其中《莽蒼蒼

⁸⁷ 〈上歐陽瓣薑師書二十八〉，《譚嗣同全集》，頁339。

⁸⁸ 此水重複，是否有誤，待查。

⁸⁹ 〈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206。

詩》分作二卷，分別收錄兩個不同時期的詩文，他自敘道：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猶不自懲，而為此無用之呻吟，抑何靡與？三十年前之精力，敝於所謂考據辭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⁹⁰。

如果不是劉淞芙勸其「少留」並「補遺」，這些三十歲以前的詩作可能就不見於世了。可是，《莽蒼蒼詩》收的盡是遊歷之作，如何可謂「考據辭章」？何況遊歷又是三十歲前唯一可稱道之事，何以「憤而發篋，盡棄之」？「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足見譚嗣同已察覺戰爭將啟，這些詩作既然於「世」無用，不如盡棄。但為什麼他能走出「同母五人，偶影坐弔」的鉅慟，更將生命投入經世大業中呢？我們正可以由《莽蒼蒼詩》探究其人性格的轉化。

譚嗣同曾賦詩〈河梁吟〉：

沙漠多雄風，四顧浩茫茫。落日下平地，蕭蕭人影長。撫劍起巡酒，悲歌慨以忼。束髮遠行遊，轉戰在四方。天地苟不毀，離合會有常。車塵滅遠道，遠道安可忘⁹¹。

這首五古很能代表譚嗣同遊歷詩作中的「憂」與「志」，而且呼應荊軻的俠義豪情與烈士精神，傳達了他對生離死別的淡視。

但是，在另一首〈古別離〉中，我們又看到他的另一種情懷：

浮生莫遠離，遠離不如死；死時猶得執手嘖，遠離徒為耳。原何高？黑何卑？高者綠縲卑塗泥，西雲架雨東雲曦。驚蓬捲天起，墜羽淪淵池。痛楚與歡樂，迢迢兩不知。張筵會良

⁹⁰ 〈莽蒼蒼齋詩自敘〉，《譚嗣同全集》，頁154。

⁹¹ 〈河梁吟〉，《譚嗣同全集》，頁451；《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8。

辰，撤瑟亦茲期。誰謂精神通，山川莫閒之⁹²。

我們暫時無法確定這首七古作於何時，但是，對應仲兄譚嗣襄的死，就可以瞭解到在遊歷過程中，他所謂的「升峻遠覽以寫憂」不是為賦新詞的強說愁，而是他在「痛楚」和「歡樂」兩極之間的矛盾與撕裂。

〈河梁吟〉收在《莽蒼蒼詩》卷第一，〈古別離〉收在卷第二，正可為兩個不同遊歷時期的代表，兩首詩流露感情差異，透露了譚嗣同性格養成的轉化，箇中關鍵不僅在於譚嗣襄的死，也在於兩個時期不同的遊歷環境。

光緒二年（1876）的「五日三喪」，在詩作中不時看見他的心情與西北的蒼涼相呼應。例如，「雪夜獨行役，北風吹短莎。動雲侵路斷，疲馬怯山多。」⁹³寫的是景；「防秋千里至，顧影十年勞。」⁹⁴寫的是情。當情與景交融時，就會看見類似詩句如：「白草原頭路，蕭蕭樹兩行。遠天連雲暗，落日入沙黃。石立人形瘦，河流衣帶長。不堪戎馬後，把酒話伊涼。」⁹⁵

透過遊歷，譚嗣同的「憂」，不僅只是個人的孤子，他開始關照到社會的陰暗面。例如，〈六盤山轉饜謠〉道盡輿夫的勞苦，也刻鏤農民的悲怨：

馬足蹙，車輪折，人蹉跌，山岌業，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嗔官！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纍纍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纍纍物，東南萬戶之膏血⁹⁶！

⁹² 〈古別離〉，《譚嗣同全集》，頁463-464；《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71。

⁹³ 〈雪夜〉，《譚嗣同全集》，頁465；《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59。

⁹⁴ 〈秋夜〉，《譚嗣同全集》，頁468；《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1。

⁹⁵ 〈白草原〉，《譚嗣同全集》，頁471-472；《莽蒼蒼詩補遺》，《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81。

⁹⁶ 〈六盤山轉饜謠〉，《譚嗣同全集》，頁463；《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7。

同樣的，他的詩中更有引劍縱馬的狂放。例如，「崑函羅半壁，秦晉界長河。」之寫景；「為趁斜陽渡，高吟擊楫歌。」之瀟灑⁹⁷；「瞪青一電瞬，劍碧兩龍長。」之俠情⁹⁸；「斗星高被眾峰吞，莽蕩山河劍氣昏。」⁹⁹之壯闊。在壯闊的西北，他嘯吟狂志：「策我馬，曳我裳，天風終古吹琅琅！何當直上崑崙顛，曠觀天下名山萬疊來蒼茫！」¹⁰⁰

譚嗣同不是紙上書生而已，他曾以校尉領軍，「挾一騎兵，閒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¹⁰¹他致劉淞芙的信自述了遊歷所養成的「志」，展現出高度的自信：

家更多難，弱涕坐零。身役四方，車輪無角。……東遊江海，中郎之櫟竹常攜；西極天山，景宗之餓鴟不釋。飛土逐肉，掉秧從禽。目營浩罕所屯，志馳伊吾以北。穹天決滌，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縱橫，抵掌遊俠之傳。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擊拳識面。於時方為馳騁不羈之文，講霸王經世之略。……以為遂足以究天人之奧，據上游之勢矣¹⁰²。

關懷國家社會的「憂」與「志」在光緒十五年（1889）的關鍵年代裡，出現了明確的焦點。十一月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展開完全不同於西北的另一段遊歷，除了往返於湖南和湖北之間，沿水路北上赴京應試，而遊歷了沿海各省，是人文薈萃的重心，也是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正面衝撞的區域¹⁰³。從

⁹⁷ 〈出潼關渡河〉，《譚嗣同全集》，頁469；《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8。

⁹⁸ 〈冬夜〉，《譚嗣同全集》，頁466；《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0。

⁹⁹ 〈崆峒〉，《譚嗣同全集》，頁480；《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7。

¹⁰⁰ 〈隴山〉，《譚嗣同全集》，頁462；《莽蒼蒼詩卷第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66。

¹⁰¹ 〈與沈小沂書〉，《譚嗣同全集》，頁431。

¹⁰² 〈致劉淞芙信一〉，《譚嗣同全集》，頁376。

¹⁰³ 譚嗣同至歐陽中鵠的信中，曾提及自己所接觸的西學與自強新政，可窺大概。〈上歐陽辦董書二十二〉，《譚嗣同全集》，頁316-318。

他的詩文書信中，可以看見浪漫與激進開始出現了聚焦。他是「湘中舊詞客」¹⁰⁴，因此詩文中流露濃濃的浪漫情懷；在譚繼襄死後，他亟欲尋求慰藉，路旁偶遇的人與物都成為他傾訴哀怨的對象。譚繼洵適巧升任湖北巡撫是個關鍵的轉折，譚嗣同離開了西北的蒼茫，在父親的衙府裡，他開始結交到許多臭味相投的師友，「瓣薑師外，若王君信余、吳君小珊、張君憩雲、涂君質初，方諸芝蘭，吾臭味也。」¹⁰⁵光緒十九年（1893）他在上海和饒先槎、李正則同影，在〈三人像贊〉中流洩的不是別離的憂傷，而是相互的扶持與期許：

三子並立饒者髯，右者維李左者譚。泔泔之海天所涵，於此取別相北南。既南既北用不咸，相語以自旁有箝。髯乎髯乎爾何談，平生已矣來可貶。右者闕沍其口緘，左者之銘神則監¹⁰⁶。

就三十歲的譚嗣同而言，或許《莽蒼蒼詩》兩卷的遊歷詩與「考據辭章」的「傳統」無異。然而當追索他的遊歷過程，在「傳統」的基調上，我們看見了在「生」和「死」的兩極之間，「憂」和「志」凸顯了「傳統」和「浪漫」性格的矛盾與轉化。西北的廣闊與蒼涼，很能貼近譚嗣同歷盡生死的心情。「杳然萬物靜，而我獨何求？」¹⁰⁷遊歷並非沖淡憂傷，而是讓他能獨自面對自身的「孤獨」，且有了沈澱、思考的空間與時間，更能真正瞭解到何謂「憂」，何謂「志」。他充滿矛盾的複雜性格，特別是浪漫與激進的因子，在西北荒漠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光緒十五年（1889）的關鍵年代裡，仲兄譚嗣襄的死，讓他的「憂」達到

¹⁰⁴ 〈武關〉，《譚嗣同全集》，頁493。

¹⁰⁵ 〈石菊影廬筆識·思篇四十一〉，《譚嗣同全集》，頁271。另，可參見〈莽莽蒼齋詩卷第二〉，《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頁70-80。關於此時期譚嗣同的師友交往，以及他在此期開始學習西學與積極接觸自強新政，早是學者論述的重點，限於時間，暫不贅述。參見賈維，〈譚嗣同的早期交往〉，《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頁98-135。

¹⁰⁶ 〈三人像贊并敘〉，《譚嗣同全集》，頁507。

¹⁰⁷ 〈夜泊〉，《譚嗣同全集》，頁467。

極致；不同師友所開啟的學問和親身接觸新政，讓他的「志」出現具體的實踐。「憂」與「志」從矛盾到交融的結合，讓譚嗣同正式迎向「傳統」與「現代」的衝撞，朝往激進參與改革的維新道路。

六、結語

纂錄弗就，劉子元所以亟憤於修史，至氣盡而繼之以血。沉譜牒前無所踵，難十於史，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不可不夙講也。士食舊德，所由兢兢寶守，罔敢墜沒。不自知其弇陋，稍易舊規，主明宗法，文或損益，其事則故，近事謹闕不錄，以符三十年增修之議¹⁰⁸。

譚嗣同將「譜牒」與「宗法」的結合，建立「齊家」到「平天下」的傳統秩序；更把「譜牒」視作「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的實踐，即使「氣盡而繼之以血」，也不可墜沒。在他三十歲時，依循「三十年增修」的傳統修《瀏陽譚氏譜》。因對「傳統」的堅持，而營造了「任卹睦婣，歡以相即，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的傳統家族景象。但當我們追尋他三十年的生命歷程，就會發現這是他可望而不可得的境地，是在「傳統」的主調上所產生的「矛盾」，「矛盾」是他性格養成的軸心。

透過《瀏陽譚氏譜》與〈家傳〉，他拉出了瀏陽譚氏家風的兩個面向：「文」和「武」。大伯譚繼昇文武兼修、經世濟民的俠義氣質，正是他亟欲達成的傳統人格典範。但在其人性格養成的歷程中卻充滿「傳統」所引發的各種矛盾的撞擊。父親譚繼洵的循吏特質，讓譚嗣同必須一再朝往科舉仕途，但他在甘肅和湖北的任官，也給予了么子桀傲與浪漫的養成環境。母親徐氏身教言教地嚴格堅守傳統婦德，令譚嗣同具涵濃厚的傳統道德觀，也塑造了「倔彊」的性格。但庶母盧氏的虐待，則讓譚嗣同自幼即面對傳統所引發的兩極化矛盾。因此，親情對於譚嗣同的性格養

¹⁰⁸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6。

成，是在「傳統」的主軸上，激發出其人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的矛盾。

宣武城南宛如亂葬岡的讀書環境，西北荒漠中生命如草芥的遊歷經驗，「五日三喪」的鉅慟，仲兄譚嗣襄的死亡，外在行為的「倔彊」與內在心理的「憂傷」衝撞譚嗣同，使他陷入既不容於己又不容於世的孤獨之中，複雜多元的矛盾性格乃被徹底撕裂。譚嗣同從未走出不見容於世的「孤獨」，他選擇並捍衛「孤獨」，把「孤獨」轉化為「輕氣球」般的強烈反叛性格，讓自己成為超出地球的「縱人」。

遊歷是譚嗣同轉化成為「縱人」的養成關鍵，是「憂」與「志」的矛盾與轉化。當追索他在兩個不同時期的遊歷過程，可以發現，在「傳統」的基調上，拉出「生」和「死」的兩極，透過詩文中的「憂」和「志」，凸顯了「傳統」和「浪漫」性格的矛盾與轉化。正是這種兩極化的性格養成，讓譚嗣同在三十歲時決定正式迎向「傳統」與「現代」的衝撞，朝往激進參與改革的維新道路。

當我們把「先祖」、「親情」、「生死」和「遊歷」四個切面組合起來，就會發現譚嗣同性格養成的生命歷程中有幾個關鍵年代：

同治十一年（1872），譚嗣同與伯兄譚嗣貽、仲兄譚嗣襄入宣武城南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宛如亂葬岡的環境，使他體驗到死亡的陰影，但也聯繫了他與仲兄之間的緊密感情。「傳統」的教育，「死亡」的陰影和「仲兄」的感情，是譚嗣同性格養成的重要因子。譚嗣襄深具傳統家風中文武合一的氣質，成為譚嗣同性格中的典範與變數。

光緒二年（1876），北京喉風，五日三喪，歷經死而復生的煎熬。母親的死讓譚嗣同面對庶母的虐待，他開始置身「傳統」引發的兩極化矛盾，致使在性格養成上，「倔彊」的外表與「憂傷」的心理出現撞擊，而逐漸走進不容於世的「孤獨」。

光緒四年（1878），二度赴甘肅，懷著喪親的鉅慟，西北大

自然的無情死亡加深了他的「憂」，但遼闊的環境也培育了他的「志」。遊歷給了譚嗣同思考和沈澱的時間和空間，雖然仍是在「傳統」的基調上，但開始轉化成為關心國家社會之「憂」，以及經世濟民之「志」。

光緒十五年（1889），譚嗣同性格養成最關鍵的一年。仲兄譚嗣襄的死，讓譚嗣同真正走進完全的「孤獨」。但是，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展開另一段的遊歷，反而結交到許多臭味相投的師友。「孤獨」和「契交」複雜的交織造成矛盾性格的重大轉化。

光緒廿年（1894），三十歲的譚嗣同透過《瀏陽譚氏譜》、〈莽蒼蒼齋詩自敘〉、〈三十自紀〉，從族譜、少作、自省三個面向，進行由遠至近、自外而內的人生總整理之後，自我選擇成為超脫地球的「縱人」，開始「壯飛」。

縱觀譚嗣同三十歲以前性格養成的生命歷程，是在「傳統」的基調上，拉出「生」和「死」的兩極，讓憂傷、倔強、浪漫、理性、激進、道德等多元因子相互衝撞、震盪後，凝聚成為不容於世的絕對孤獨，意欲衝決自我矛盾性格所撕裂、交織而成的「網羅」。

附錄：譚嗣同簡譜

同治四年 1865	二月十三日生於北京宣武城爛眠胡同。	江南製造局成立。
同治五年 1866		孫中山出生。
同治六年 1867		唐才常出生。
同治七年 1868		左宗棠西征。
同治八年 1869	始受書，與仲兄嗣襄師事畢莼齋，審四聲，能屬對。	章太炎出生。
同治九年 1870	從雲南楊先生讀書。	天津教案。
同治十年 1871	母徐夫人絜伯兄嗣貽南歸就婚。	俄強佔伊犁。
同治十一年 1872	與伯兄嗣貽、仲兄嗣襄入塾，塾師韓蓀農。	《申報》創刊。
同治十二年 1873	徙居庫堆胡同瀏陽會館。	梁啟超出生。
同治十三年 1874	父繼洵任戶部員外郎，延請歐陽中鵠、徐大圃主其家，與仲兄嗣襄受業門下。	牡丹社事件。
光緒元年 1875	父繼洵升戶部郎中，春，赴北通州監督坐糧廳，隨侍公所；猶時往北京。	德宗即位。
光緒二年 1876	北京喉風。染疫短死三日更蘇，父賜字「復生」。仲姊得疾，卒後四日，二月初一日，母亦卒，後一日，伯兄嗣貽卒。是歲，親屬沒京師者六人。	淞滬鐵路通車。
光緒三年 1877	八月，父繼洵補授甘肅道台，加二品銜。冬，隨父返鄉掃墓，結識唐才常。	
光緒四年 1878	侍父赴甘肅任，觸暑前進，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餘人。	蘭州製呢局成立。
光緒五年 1879	夏歸瀏陽，拜涂啟光為師。	
光緒六年 1880	居瀏陽原籍讀書。	
光緒七年 1881	居瀏陽原籍讀書。秋日遊長沙，尋歸。	魯迅出生。
光緒八年 1882	春赴甘肅，冬返湖南。作〈望海潮〉。	
光緒九年 1883	春赴蘭州，四月初三日娶長沙李壽蓉之女李閔，婚後尋赴甘肅。	中法戰爭。
光緒十年 1884	得新疆巡撫劉錦棠疏薦。	新疆建省。
光緒十一年 1885	春歸長沙應鄉試，不中。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	台灣建省。
光緒十二年 1886	春抵蘭州。伯父譚繼昇卒於故里。	《天津時報》創刊。
光緒十三年 1887	居蘭州藩署憩園鑿申軒。	
光緒十四年 1888	夏歸長沙應鄉試，不中，嗣襄赴台灣。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	康有為第一次上書。
光緒十五年 1889	春抵蘭州，尋赴北京應鄉試。五月，嗣襄卒於安平蓬壺書院。冬，仲子傳簡卒。拜同鄉劉人熙為師。作十五至二十五歲詩一卷。父繼洵升甘肅布政使，十一月升任湖北巡撫。	光緒帝親政。 張之洞調湖廣總督。

光緒十六年 1890	春，侍父赴湖北巡撫任所。夏歸湖南，秋返。赴安徽，尋返。作〈相痕詞〉。	湖北鐵路局成立。
光緒十七年 1891	秋歸長沙應鄉試，不中，冬返鄂。十一月，揀嗣襄遺文為《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作〈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	
光緒十八年 1892	居鄂，埋首研究王船山學說。	湖北大冶鐵礦成。
光緒十九年 1893	春赴蕪湖，尋返。夏赴北京應鄉試，不中，結識吳樵；經上海，結識傅蘭雅，與饒先槎李正則同影，作〈三人像贊〉。秋返湖北。	毛澤東出生。
光緒廿年 1894	秋歸長沙應鄉試，不中。冬返鄂。更名「壯飛」。作《瀏陽譚氏譜》四卷、〈三十自紀〉、〈莽蒼蒼齋詩自敘〉。	甲午戰爭。
光緒廿一年 1895	八月，籌組「瀏陽算學社」。九月，溯江至上海，遊北京，結識梁啟超，知康有為講學宗旨，乃自稱「私淑」。	康有為倡強學會。 康梁公車上書。
光緒廿二年 1896	二月，經上海再訪傅蘭雅。夏，經天津，參觀新式工業。六月，赴北京，結識夏曾佑，接觸佛學。七月以父命赴金陵就官候補知府，結識居士楊文會，遍窺三藏。始撰《仁學》。八月，任《時務報》董事。	上海《強學報》出版。 上海《時務報》創刊。 嚴復《天演論》譯畢。
光緒廿三年 1897	一月，「瀏陽算學社」成立。《仁學》完成。十月棄官歸湖南，參與新政。《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遠遺堂集外文續編》、《石菊影廬筆識》二卷，付刻於金陵。	長沙《湘學新報》創刊。 天津《國聞報》創刊。
光緒廿四年 1898	七月廿日抵北京，光緒帝召見，以四品欽銜在軍機章京行走。八月六日政變，尋被捕，十三日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	百日維新。 戊戌政變。

資料來源：譚嗣同，〈三十自紀〉，《譚嗣同全集》，頁 204-207。陳乃乾編，《譚瀏陽全集（附年譜）》，頁 11-24。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楊廷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王樾，《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附錄：譚嗣同年表〉，頁 143-150。

Suddenly this man is claimed to be I— Try to Analysis How Tan Si-tong's Character Was Built

Chang Yun-tsung

Abstract

Tan Si-tong was known as a 'martyr' and 'thinker', this image processes both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modern China's converting era, and is the key point for scholars ever researched. This essay plans to leap from the mode of theory, get rid of the inevitable demonstration of a 'martyr' and the thoughtfulness of '仁學', but to explore how Tan Si-tong's character was built before the maturity of his thought through the texts he left behind, and to inquire throug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ncestor', 'family affection', 'life and death', and 'peregrination', into Tan Si-tong's character which was based on the keynote of 'tradition', and dragged out the two poles of 'life' and 'death', so that the various contradictory factors crashed and shocked each other, and then condensed into the unacceptable absolute solitude. His heading for the way of radical reform was an intention to burst the 'toils' interweaved, and torn by the self-contradictious character.

Key words: Tan Si-tong, Genealogy, Tradition, Solitude, Statecraft

